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

中国政治的背景

革命的背景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 1911—1949 年这样一段时期，并且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事件。1911 年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已统治国家数世纪之久的王朝。第二次革命在 1928 年达到了高潮，它建立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央政府，以一种更有朝气、更有组织和一党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民国早期的多头“军阀”统治。1949 年第三次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共产主义体制的出现。

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推翻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精英层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推出了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过程本身的界限。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具有破坏性以致可以说它是一次“具有特征性的革命”是“儒家中

国的末日的开始'^①。而且 尽管共产党在 1949 年取得了胜利 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1966 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 10 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②。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 但它确实表明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

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 中国政治的革命背景既是迷人的 又是令人困惑的。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迷。如今 在此之上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 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 并且仍在演示着。然而 无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如何 对于革命政治切不可作出轻易的理解和概括。在本章后面 我们将讨论围绕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而展开的辩论 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先要在这里提一提。

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自然是革命的实质。显而易见 现代中国政治是不稳定的，在革命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致关于某一个时间段的那些描述，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往往是不正确的。这些变革怎样经常地推翻人们所设想的关于中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并非显而易见。让我们考虑

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 1 卷：《历史》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6 年 第 199 页。

《北京周报》英文版第 42 期（1968 年 10 月 18 日）第 26、31 页。

确实，邓小平把 1978 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 年 4 月 8 日 第 6 版。然而 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具有通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的特征。对毛泽东以后政治这一革命后特征的深刻的分析，见洛韦尔·迪特默尔《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载《亚洲观察》第 24 卷第 3 期（1984 年 3 月）第 349—369 页。

一下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是某些观察家所坚信的若干观点吧。人们在各个时期持这样一种看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本位的社会取得成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坚定盟友 意识形态的联系使得中苏联盟不可动摇 中共的权威不可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与中国在 50年代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欢迎外国在其国境内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颇有道理 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在于 要分析革命的时代 就应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智慧。

其次 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 将许多差别转变成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能达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前程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 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到那时 武装力量的使用或威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中国在 1911—1949 年间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 1949—1958 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 1959 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 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 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到 80 年代中期 中国进入了其“后革命时代” 军队的政治作用处在 1949 年以来、也许是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最低潮。

最后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老生常谈而又不可避免的问题 即资料来源和证据确凿的问题。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状况的知识并非易事。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 大部分 当然并不是全部 取自共产党的正式文献 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和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 1949 年之后中共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

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工作都会困难重重。原始材料也许已丢失、毁坏或是封存了。关键事件的参与者也许会保持沉默。独立的资料来源也许遭到了压制。而官方的消息显然带有宣传的性质。让学者和官员获取资料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受到重视。而且在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获取资料也是极其困难的。

1976年以后，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由于这样一种趋势，也由于对外国旅游者和居民的更大开放以及给予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更大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了从各个来源和角度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多得多的信息。然而，在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这些空白和矛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来自中国出版物以及中国大陆移民、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来源的那些原始材料。要研究中国政治，仍然必须清楚地看到资料来源的限制，看到这一问题如何影响对这个课题本身的解释。

历史背景

发生中国革命的那个社会，其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和长期性已人所皆知。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何以影响革命的历史；而在此则指出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之重要，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印象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微妙性质，但是有关中国的这些印象的重要性则是一清二楚的。确实，在现时代，这些历史印象一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和能力的夸大估量。这些印象曾表现为一种

见 M. 奥克森伯格《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资料来源和方法论问题》，载 A. D. 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 577—606 页，以及艾米·威尔逊编《中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纽约，1983年。

危险的妄自尊大 清朝皇帝曾以这种态度对 18 世纪晚期开始的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或许西方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同样被误导了 他们曾预见过 在商业或宗教上征服中国将可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人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虚幻的印象。冷战中的美国人惧怕中国对东南亚的独占 对非洲的影响或是对北美大陆的军事威胁 这种恐惧乃是产生于对想像中而远远不是现实的中国力量的估计。中国人也试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引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希望和恐惧，但中国的传统仍然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更实际的方面看 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 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诸多比较主要是与历史的比较——与封建王朝、与国民党、与“解放前”、与“文化大革命前”或是“四人帮之后”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制度比较。他们利用著名历史人物来与当代英雄和坏人作类比，从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借用了许多例子和作比喻的形象。

这种在当代政治进程中加进历史因素的做法，部分是出于一种文化特质 部分则是由传统体制的封闭性和相关性所造成的。直到最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 1911 年清朝覆灭之前出生的。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对清朝帝国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部分接受了传统方式的教育。较年轻些的领导人是 1949 年以前从政的 也很了解 1911 年以后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简言之 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

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使它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其人口（1984 年底为 10.36 亿）是世界上最多的，约占世界人口的 1/5。1949 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从积累来看是高的，尽管有 60 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官方统计数字记载了从 1952 年到 1982 年的下述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数）：国民收入 6.0；人口 1.9；社会总产值 7.9；工业总产值 10.7；农业总产值 3.8。由于价格和计算上的差别，外国观察家通常降低中国的工业产值，从而降低了它的总体增长率。然而，中国经济从 1952 年到 1980 年仍增长了 4 倍多。到 80 年代初，它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全世界占第 9 位，在它前面的只有 7 个工业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看作大致相当于 20 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

世界银行《1983 年全球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第 152—153 页。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某些较高估计认为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使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

② D. H. 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 R. H. 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 1981 年，第 115—117 页。

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 第一部分》，华盛顿 GPO 1982 年，特别是 R. F. 德恩伯格《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 19—76 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 99—118 页。

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71 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1983 年它与 12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 25 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 400 万人。其中军人占了 300 万人以上。中国在 1964 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 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发射能力在增长，尽管还落在超级大国的后面很远。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1978 年 12 月美国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为它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移去了最后一个正式障碍。

上面是对中国的国际背景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量。这种观点必须由以下几点来作补充。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它的绝对值，而不是它的发展水准。尽管有着高增长记录和 30 年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其农业部门。按人均国民总产值约 400 美元计算，它仍然处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而且，它的食物—人口平衡是不稳定的，从而使发展战略问题复杂化了。其基本问题在于，仅有 50% 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大部分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80% 集中于中国全部土地中 1/6 的良田上。为了支持工业化和养活全部人口，中国必须保持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它已经这样做了，但所超过值很小。在 60 年代的危机时期，人均谷物产量远远低于 50 年代的高峰水平，直到 70 年代末才达到新的高峰。近年减低的人口增长率（1983 年和 1984 年均为 1%）以及 1976 年以后由于采取新的农业政策“承包责任制”而大大促进的农业生产，都有助于使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这些趋势减轻了食品—人口平衡问题的压力。当然，假如连年歉收或再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仍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食品短缺。无论如何，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技术的革命。当前通过增大对农户的物质

刺激来促进农业增长，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束如何将技术改造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争论。

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麻烦。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破坏在国家控制之下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交通和住房落后于其他方面，此外，中国尽管在能源方面有惊人的潜力，但却一直存在能源短缺。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是未来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赖外贸、技术和资本，这就向中国的政治上层人物提出了微妙的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保持低效率和抗拒变革。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将轻易实现、自然发生，或不再具有严重的内部紧张和冲突。

其次，当前中国跟国际体系的合作，与它对过去的国际冲突和不安全感的体验形成了反差，这些冲突和不安定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个特色。在整个50和60年代，它把美国看作是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美国卷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澳美新条约国等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条约，也由于美国人包围和孤立中国的种种做法。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政权一直到1971年还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并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外交承认。与印度的严重领土争端导致1962年的短期边界战争，随后便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多年紧张关系。在60年代，中国人强烈地担忧日本的再度军事化。最重要的是，1960年以后中苏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潜在目标。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交火，使苏联突出地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成了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重新接近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随着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得更为和平（主要的例外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冲突）。

然而，中国相对孤立和不安全的先前那段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其部分缘由是它使自力更生与影响了政治上一代人的革命好战情绪相结合 部分则是因为某些特定的争议悬而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对台湾、印度和苏联边境地区以及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群岛提出未决的领土要求。对这些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但从长期的预测来看 却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作为一个力争赶超的军事落后的大国，中国对国际限制军备和核试验的条约持怀疑态度。它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对薄弱，正如 1983 年 400 亿美元的估计外贸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而同期台湾的外贸额估计为 450 亿美元 香港则为 350 亿美元。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并未结束对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威胁。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低于苏联的实力 因此 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仍然具有高度的优先性。

最后 如果认为中国已加入“国际俱乐部”那是有悖于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革命力量的形象的，这种形象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曾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的看法。在这些年里，中国越来越表现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是世界权力结构的自觉反对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作为取代西方和苏联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选择，中国内部毛泽东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里不准备评价毛泽东主义模式的特异性^① 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应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外国观察者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世界的反对者和明确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现存秩序挑战而不是迁就它的追求激进变革的

作为有关毛泽东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异性和移植的可能性的争议的一个例子 见约翰·戈莱《中国的经济和毛泽东主义战略》纽约《每周评论》1976 年 M. 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1973 年 R. 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纽约 1979 年 以及 D. 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中的毛泽东》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7 年。

力量。这种形象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复杂化了，自毛泽东 1976 年 9 月逝世之后，他们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以追求国家安全和获得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国外贸易、技术和资本。

革命的、历史的和 international 的背景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中国革命时代变革的广度和速度，同时又得认识它与植根于中国两千年帝国秩序中的那些模式的联系，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这场革命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派别之见，同时又要使用这些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惊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与棘手的问题和落后面并存；必须思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寻求安全和支持的努力，尽管它试图改造这种秩序并避开其局限性，还必须理解中国朝向或者脱离毛泽东主义、苏联和西方发展模式概念的运动的辩证法。这些挑战加强了在这个课题的迷人性质，并有助于解释，围绕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究竟应强调哪些问题和哪些模式这一议题，外国观察家何以展开过这么多的辩论。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学者们试图追踪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富有挑战性的现实时，这种围绕问题和模式的辩论何以一直在变化着。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

1949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争论和对它的总结是围绕着与它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乃至对于这个新政权的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这种历史导向有许多理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这一领域中的政治学家却相对寥寥。由于共产党政府的新颖性和有关它的信息的不确切性，人们不大愿意对 1949 年以后的事件作彻底的考察。就美国人而言，拒绝与中国大陆接触，老是盯着中国何以落入共产党人之

手 这些问题左右了政治的思考。有段时间 所有这些考虑都失去了它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直接针对 1949 年以后中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然而，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的争议过多地依靠 1949 年以前的资料和文献，这种倾向曾垄断了早期总结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争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的论题或争论点：毛泽东主义的独立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中国与外国影响；1949 年共产党胜利的根源。

毛泽东主义与正统思想

关于‘毛泽东主义’的争论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而展开的最明显的、充满异议的和持久的辩论。当《中国季刊》(这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刊物)在 1960 年开始出版时，毛泽东主义是该刊头两期两篇主要文章的论题^①，这种选择恰恰表明了它看起来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论题。这里不去陈述这位或者那位个别作者的具体论点，而只是简单地摆出这场辩论中的一般倾向。赞成“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人认为，由毛泽东领导体制所规定并由他的著作所阐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形式是独特的、叛道的或异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莫斯科。那些赞成中国‘正统’而不赞成‘毛泽东主义’提法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战略多远，他们觉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依赖于莫斯科。当然在事实上，这场辩论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而且正如上述简化了的说法所表明的，它提出了对理解 1949 年以后中国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和莫斯科没有密切联

^① K. A. 惠特福格尔《‘毛泽东主义’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 1、2 期(1960 年 1—3 月、4—6 月)第 72—86、16—34 页；以及 B. 施瓦兹《关于‘毛泽东主义’传说》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 2 期(1960 年 4—6 月)第 35—42 页。

系的革命者呢，抑或他们不过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种运动的中国分部的领导人？

中苏冲突解决了有关中国政治独立性的问题，支持了“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尽管在 50 年代俄国人对中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西方也普遍地把毛泽东主义（中国人自己绝少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当作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独特分部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接受。1949 年以后毛泽东主义的胜利自然加强了那些强调它的 1949 年以前的根源的人们的观点^①。然而，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辩论仍然在两条广阔的阵线上展开。第一，对毛泽东早期偏离苏联学说的确切时间和程度仍然有争议，争论集中于 1927—1935 年间革命战略的复杂细节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第二，目前正在开展的究竟谁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讨论，是近期内更引起人们兴趣的论题。假定在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要差别（目前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否认这种情况了）那么，是毛泽东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更符合其父辈学说？俄国人和一些西方分析家尽管观点并不一致，但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更正统，而毛泽东主义则偏离了正统，它偏向于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某种变种。中国人和另一些西方分析家（观点也不一致）则认为，毛泽东主义更接近马克思

对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绝妙考察，见 S. R. 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版 纽约，1969 年，还可见于 B. 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例如见萧佐良（Hsiao Tso-ling）《中国共产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1 年；I. J. 金《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江西苏维埃》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3 年；J. E. 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6 年；S. 斯瓦鲁普《1927—1934 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6 年，以及 R. C. 索恩顿《1928—1931 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69 年。

主义价值观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而认为苏联表现出朝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异端倾向。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实际情况要比这里所介绍的复杂得多。由于目前中国人正在推翻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主义核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政策，这一问题便更加复杂了。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以前肯定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相似性的观点又复活了，尽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显而易见。

中国与外国影响

当中苏分裂使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争议冷却下来的时候，与此相关而又更加微妙的问题又提上了前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究竟是表示可能毁灭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西方思想，假如不是俄国思想的话，征服了中国呢，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这个新朝代的某些作风是外来的，但又忠实于传统的统治模式，尽管人们有时会暗喻中共的“朝代”或把毛泽东比作“皇帝”），但如果严肃讨论这个论题，就应避免正式接受这两种极端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也是传播异于中国的外来价值观的温床，这种看法变得更为普遍了，尽管它很少不加修饰地出现；当然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中找到了强烈的依据。C. P. 菲兹吉拉尔德则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另外一种观点，他指出了共产党人与中国传统统治方式之间强烈的相似性。他特别强调“世界主权权威”的观念，为了平衡经济而实行的国家管理，以及为了整合社会和提供选拔精英标准而确

见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上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论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3卷第1、2、4期（1977年1月、4月、10月），这几期“论坛”中收集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和评论。

立的一种正统学说。

当代中国政治显然表现为内部和外来影响的混合。上述辩论的真正价值不是证明某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而是要确定这种混合影响究竟是什么。由于主导倾向集中于中共精英所实现和寻求的变革，因而人们便会很正常地注意另外那些肯定中国的“中国性”的人们。费正清曾持有一种中庸观点，而且他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始终不渝的发言人，他要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在当代已被削弱或破坏的结论持慎重态度，无论意识形态和官方导向怎样有可能暗示这一点，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为中国人的行为提供了某种解释^②。后面几章的分析将探讨中国历史的影响依然明显存在的许多种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国与外国影响的确实作用的辩论，并不只是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注，好像中国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从 19 世纪晚期起就一直明确地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对于如何运用外国和中国的东西重建自己制度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中国人最近谴责“四人帮”不合理地赞扬中国的东西、排斥外国的东西，这正是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指出了长期“封建权威主义”传统和很短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经验，也肯定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学习先进国家，这些例子表明他们再度感兴趣于外国对现代中国的

^① C. P. 菲兹吉拉尔德《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企鹅出版公司 1964 年 第 41—42 页及其他各处。

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坎布里奇 贝尔克纳普出版社 1967 年。

对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分析，可见 S. R. 施兰姆《导论：从历史角度看文化革命》载施兰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3 年 第 3—27 页。

影响的积极方面。如此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视角都在转向更细致地评估中国传统和外国对革命影响的益处和责任的复杂方面。

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

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三个主要争论点是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胜利的根源问题。怎样的条件和诉求赋予中共夺取胜利的力量？它又导致了怎样一种革命？C. 约翰逊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共产党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论点^①。约翰逊论证说，中共领导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的农民，这一点与该党上升为全国政权的争夺者有联系；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的力量。日本的侵略显然使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该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最后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人所作出的反应对于中共夺得大陆政权的时间和阶段安排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确定共产党人胜利的基础时，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国民党的弱点和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双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都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中共党员的组织和个人行为对扩大党的影响起了主要的作用，且不说某些特定的争议

^① C. A. 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62 年。对约翰逊这一论题的批评由 E. 勒纳作了总结。见《中国农民和帝国主义 评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载《研究亚洲学者通报》第 6 卷第 2 期（1974 年 4—8 月）第 43—56 页。约翰逊对他的批评者们作了回答：《再论农民民族主义：一本书的传记》载《中国季刊》第 72 期（1977 年 12 月）第 766—785 页。

使得某个方面容易受到共产党人的渗透。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这种能力体现了似乎是共产党革命的悖论：即它与其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倒不如说是以农民为基础。而且，由于其农民基础，这一运动与许多传统的农村组织和反抗形式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抵消日本人的出现和中共为抵抗它而诉诸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这些因素毕竟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个多因素的现象，不能只是把它贴上“全国性”革命或是“社会”革命的标签。也可以这样来谈论 1949 年以后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独立和重建的主题继续与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论题混合在一起。

上述围绕中国共产主义本质的辩论提出了有关 1949 年以后体制的重要问题，但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当然，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回答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并不只是中国所独有的；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学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并不十分成功。正如本章前面介绍性的段落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实质本身向任何简单的定义发出了挑战。在中国人的例子中，当学者的研究范围成倍地扩大时，原先的“要么……要么……”的问题已不再适用，人们开始认识到所提出问题的复杂性。

为了列举共产党革命的多样化的解释，可参见 L.拜艾诺《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1 年；R. E. 伊斯特曼《破坏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的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4 年；W. 辛顿《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文献》纽约 每月评论出版社 1966 年；R. 小霍夫海因兹《打碎的浪潮》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7 年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 农村影响类型，1923—1945》载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第 3—77 页 Tetsuya Kataoka 《中国的抵抗与革命 共产党人与二次统一战线》，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8 年；E. J. 佩里《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0 年；M. 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1 年 以及 R. 萨克斯顿《论农民革命和全国抵抗：一个特别与现代中国有关的农民动员和革命战争的理论》载《世界政治》第 30 卷第 1 期（1977 年 10 月）第 24—57 页。

这也许是一项健康的发展。无论如何，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政治的归类问题何以无功而返，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个题目。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

在 60 年代 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开始降温 有关 1949 年以后中国政治的文献大量涌现。此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并不具有一个主导模式 而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主导模式 它就可为人们分析该体制的归属问题及其相当的多样性提供一条指导线索。最初的一种倾向是称中国为集权体制，或者至少是把它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入一类。取代这一倾向的是 人们更感兴趣于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的制度 这就脱离了欧洲中心的模式 转而强调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似性。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 即用该体制自己的语言来确定它的归属 把它当作中国的或毛泽东主义的模式 这个模式亦可算作一个独立的类型。

集权主义模式

集权主义 (Totalitarian) 的理论对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很具有诱惑力 这一点不足为怪。集权主义理论原本是从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把苏联当作战后时代集权主义的主要模式。当中国宣布自己效仿苏联模式时——当时斯大林还活着——人们自然倾向于把中国划归集权主义模式。而且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行为和体制表现出足以“适合”这一模式，特别是当它趋向意识形态的划一性和一个政党垄断权力的时候 更可以为它所宣称的适用性作辩护。尽管人们广泛接受了这一术语并隐涵地使用了这一模式 但并未展开对“中国集权主义”的规模的充分分析。人们不愿意将这种集权主义模式系统地运用于中国体制的所有方面。